

## 语言符号的功能色彩

郝 斌 于 洋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中, 语言不仅仅是消极地充当交际的工具, 而且常常会反过来积极地干预这一交际过程。任何一种语言手段和语言单位, 由于长时期使用于某一特定的语言场合均可能获得某种功能色彩。本文试图通过语言符号语义结构内外因素相互关系的研究, 说明功能修辞意义实际上是对符号语义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一相互作用中, 语义结构中的“符号—符号使用者”关系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符号语义; 符号使用者; 功能色彩

**中图分类号:** H355

**文献标识码:** A

应该说明的是, 本文中所采用的“功能语体色彩”这样一种表达法是考虑到这一术语已经在语言科学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就我们的研究而言, 我们更倾向于将语言单位的功能语体色彩视为是一种意义。后者构成了该语言单位全部语义内容的一部分。(参见郝斌 1987) 因此, 在我们下面论述中, 随着对这一概念不同方面的侧重, 我们的思考将游移于“色彩”和“意义”之间而导致选择不同的术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修辞色彩”和“修辞意义”等其他术语的使用中。

语言科学研究中一个通行的说法是认为语法和修辞的区别在于: 符合常规的是语法, 打破常规的为修辞。于是, 如何界定“常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 所谓“常规”问题, 亦即某一语言手段的使用是否符合“通常规范”问题, 更多地涉及“语言符号的使用者”对语言符号语义各个方面的评价或关系问题。或者说, “符号使用者”对“符号”的特定使用是否认同。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将这一认同或非认同看作是语言符号意义自身在使用中的自然显现或非自然显现, 那么, 语法和修辞的问题最终将归结于语言符号语义结构内外因素的全部吻合、部分吻合乃至不吻合的问题。这样一来, 我们的研究最终回到了语义学的领域, 而不再游离于各个学科之间, 从而避免了这一概念最终成为一个不同学科各取所需的工具而具有含糊不清、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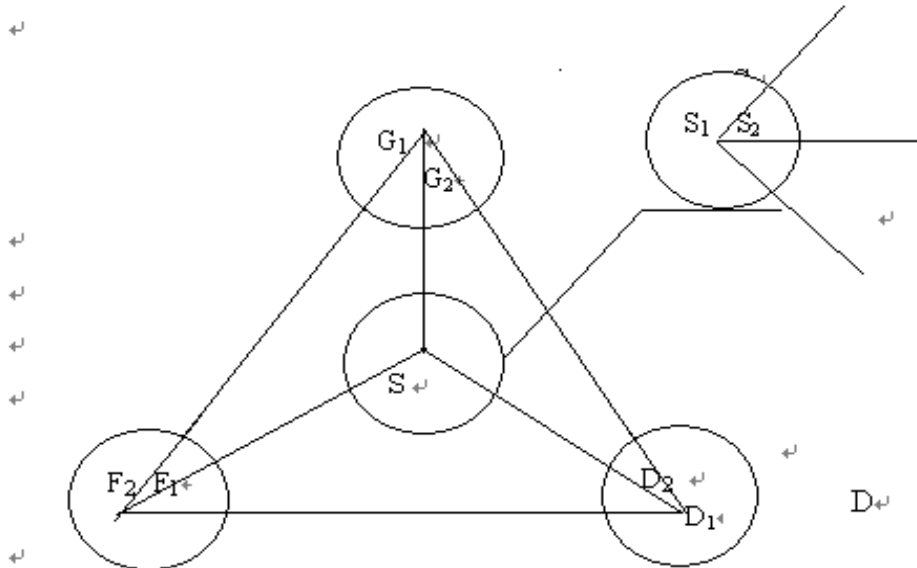
### 1 语言符号的功能色彩

随着对语言现象功能研究的深入, 下列原则越来越引起研究者们普遍的认同: 语言中的修辞手段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 1) 表情感—情态性手段和 2) 功能修辞性手段。后者构成功能修辞学的研究对象。

在交际过程中, 人类要借助语言手段表达思想。这时的语言一方面具有规范性, 通过约定俗成的语义促成交际各方的彼此理解; 另一方面, 交际各方又通过强调特定的语义成分,

借用特定的修辞手段表达其一定的情感—功能内容。

作为语言单位的意义基础，我们提出了关于语言单位的金字塔式语义结构模式。这一结构由4种语义要素和9种基本语义关系组成。其中四种语义要素分别是：符号的观念义，符号的对象义，符号使用者和符号的形式义。九种基本语义关系为：使用者分别对符号的观念义、符号的对象义、符号的形式义的认识关系（3种）和相应的情态伴随意义（3种），以及符号的形式义对符号的观念义、符号的对象义、符号使用者的表达关系：



如果这一语言单位停留在词语的平面上，那么，对于该平面的语言单位的语义结构来说：

S<sub>1</sub>: 词汇的客观使用者（个别或团体的）；

S<sub>2</sub>: 词汇语义中凝固的关于符号使用者的信息，即符号所反映的符号使用主体（S<sub>1</sub>）的属性；

F<sub>1</sub>: 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词语（个别或一般的）；

F<sub>2</sub>: 词语的形式结构（词形的心理表象）及其他形式方面的属性；

D<sub>1</sub>: 事物或对象（个别或一般的）；

D<sub>2</sub>: 符号所能唤起的关于 D<sub>1</sub> 的主观事物（或对象）的形象（或表象）；

G<sub>1</sub>: 客观事物（或对象）属性（个别或一般的）；

G<sub>2</sub>: 反映对象（或事物）内容的内涵意义及该对象（D<sub>1</sub>）的其它概括性属性。

对于语言符号的语义来说，S<sub>1</sub>、F<sub>1</sub>、D<sub>1</sub>、G<sub>1</sub> 构成其语言外因素，而 S<sub>2</sub>、F<sub>2</sub>、D<sub>2</sub>、G<sub>2</sub> 则构成其语言内因素。

同语言的其它方面相比，语言单位的功能语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外因素的作用。语言符号的语体属性，是在语言长期使用过程中形成的，是语言外因素对语言单位内容本身反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到结论，认为语体意义的形成完全取决于语言外因素，则我们就大错特错了。这样一种观点明显地有悖于下面这样一个语言事实：

语言在人类的言语交际过程中，不仅仅消极地充当着交际的工具，而且常常会反过来积极地干预这一交际过程。任何一种语言手段，任何一个语言单位，由于长时期使用于某一特定的语言场合，均可能获得某种功能色彩。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一语言手段（或单位）因此已经具有了某种功能语体的属性。为了具备这一属性，相应的语言手段必须经历“功能色彩意义化”的全过程，即从最初偶然被动地应用于某一特定的语境发展成为积极地参与构建类似语境的转变过程。缺少了这一过程，语言中所谓的功能语体手段的存在将是不可思

议的。遗憾的是，并非所有的研究者均意识到这一点。一些研究者在描述语言手段的语体特点时，其侧重点是放在语言外因素上，认为脱离了具体的语言场合将无法回答有关语言和言语中修辞性变体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所列举的功能修辞手段也都是对应于某些固定交际场合的确定的语言手段。然而在具体的言语作品中，我们常常看到一种语体的词汇被用于另一种语体中。对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又将如何解释呢？

具体言语中功能修辞手段的使用，取决于该手段语言外和语言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语言内的功能修辞手段，通过语言外的语境因素显示出它们的全部活力。我们在政论文中所发现的带有明显诗歌色彩的语言单位，或者被称之为具有哲学味道的文学作品，恰恰都证明了这样一种相互作用关系。

自从德·索绪尔在语言学中区分了语言和言语之后，全部语言学的研究均是沿着这两个方向进行的。根据维诺格拉托夫的观点，语体是统一的语言结构中一些由词形、词列和语言构造组成的分体系，而言语修辞学是“以语言修辞学为基础的”。“语言体系不仅产生于言语，不仅在一定的界限中约束言语的发展，同时也得益于言语，在言语的作用下逐渐成长壮大起来”。（В. Виноградов 1963: 5, 14）任何一个语言范畴离开了具体的言语实践都不可能存在，而任何一种言语实践反过来又同众多的语言范畴紧密相连，并且以后者为其存在、发展的基础。夸大语体对交际情景的依赖性将导致否认在语言手段中存在着固定的表语体成分，认为语体仅仅存在于言语中，最终使我们丧失言语的语言学基础，进而得出语体具有非确定性和主观任意性的结论。

## 2 构成语体意义的语言内外因素

我们认为，语言单位的功能语体意义主要表现为语义结构中的符号使用者对符号的确定的评价性关系。符号使用者在长期使用符号的过程中，随着对符号意义日趋深入的认识，逐步形成了对符号的特定的评价关系，即倾向于在确定的交际场合固定地使用特定的语言符号的方式。久而久之，这些固定的使用方式逐渐发展成为相应语言符号使用中必不可少的伴随性特征，并作为一种语言外因素反过来作用于语言符号的内容，进而成为了该符号语义的一部分。同符号语义内部的其它关系一样，符号使用者对符号的评价关系是在人们的言语行为中实现的，并最终在语言符号中被固定下来，因此也就赋予了该符号某种功能语体的“色彩”。

我们承认属于某一语体的语言符号确实常用于相应的交际场合。但是这种吻合不是仅仅由语言场合决定的，或者是由该符号的事理—逻辑意义决定的。符号一旦成为符号并具有了实体的属性，即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现实，则对这一符号来说最早出现亦是最基本的关系就是符号和它的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词语所具有的语体意义仅仅是语言发展到特定时期的产物）。随着人类认知过程的发展和符号使用者本身的分化（如符号使用者在社会分工方面以及在其他领域的进一步细分）这一关系逐渐被作为“符号使用者——符号”关系被最终记录在了符号语义中。“语体非一日形成”。（徐师曾 1962: 75）

我们关于符号的功能语体意义主要地（如果不是在全部意义上，因为在符号语义结构中“符号使用者”始终处于与“符号”和“对象（概念）”的相互作用中）取决于符号语义结构中的符号使用者因素的观点，并不排除特定的言语场合和交际目的的作用和影响。二者构成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实际上，进行着某种特定言语行为的人始终是处于特定的交际场合中，并且在不断地改变着自我，旨在适应该交际情景。例如，诗人的语言理所当然地要有别于音乐家的语言。这里的前提是我们所称之为“诗人的语言”或“音乐家的语言”的东西，不是这些人毕其一生经历而进行的言语活动的作品的总和，而仅仅指那些诗人或音乐家借以完成自己神圣使命而使用的言语片断的总和，那些从这样一些片断、即所谓的“个人语言”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条件地将符号语义结构内部的符号使用者分为不同的变体。这样一种划分具有类型学意义，并且是以语言外的符号使用

者的社会分工或社会差别为依据的。这多少类似于人们对家具的分类。我们从每件家具的形式和功能出发，对它们进行区分，而最终得到的仍然还是家具，而不是它们的形式或功能。同个人可以在社会中从事诸多方面活动相应，语义结构中的“符号使用者”“因素亦表现出语体上的多功能性。符号使用者”所具有的多功能性取决于人的社会活动的多样性。当这一多样性反映在语言符号中时，后者就相应地染上了多功能的色彩。这样一种情况构成了现实中语言单位功能语体交叉的语义学基础。

只有从符号语义内部的“符号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够理解语言学中为什么会有如此纷繁复杂的功能的分类，解释为什么一种语体的语言单位可以在另一种语体中使用，以及不同语体的语言单位彼此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下从其他学科转入到语言学的术语就足够了。

我们已经谈到过“诗人的语言”有别于“音乐家的语言”，但是这一区别并不妨碍两种“语言”可以在同一个符号使用者——诗人兼音乐家身上被有机地统一起来，例如：

К отъезду музыканта-друга	在我的音乐家挚友离别之际，
Мой стих минорный тон берет,	忧伤的小调浸透了我的诗句；
И нашей старой дружбе fuga,	赋格曲的乐章袅袅升起，
Вс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растет...	赞美我们多年的友谊。
Мы увертюру жизни бурной	曾几何时你我唇齿相依，
Сыграли вместе до конца,	共同演奏了青春的序曲；
Грядущей славы марш бравурный,	勇往直前，期盼未来的荣誉
Нам рано волновал сердца.	很早就令我们激动不已。
В свои мы верили таланты,	我们曾笃信自己的天赋，
Делились массой чувств, идей...	共同分享过心底的秘密；
И был ты вроде доминанты	在我青春的曲曲和弦中，
В аккордах юности моей.	你一直是其中的主旋律。
Увы! та песня отзвучала,	呜呼，激动的一页已经翻过，
Иным я звукам отдался,	我现在面对的是另一些曲式；
Я детонировал немало	走调成为了家常便饭，
И с диссонансами сжился.	我已然习惯于不和谐的旋律。
Давно без счастья и без дела	久已告别与生而来的天赋，
Дары небес я растерял,	百无聊赖，浮沉由世；
Мне жизнь, как гамма, надоела,	生活犹如音节一样让我烦恼
И близок, близок мой финал.	涅槃之乐章即将奏起。
Но ты, когда для жизни вечной	但在我下葬的那一时刻
Меня зароет под землей, —	请为我保留最后的情谊；
Ты в нотах памяти сердечной	但愿你心灵记忆的乐章中
Не ставь бекара над мной.	不会给我打上还原的标记。
(П. Чайковскому, Апухтин)	(阿普赫金：致柴科夫斯基)

### 3 “符号使用者—符号”关系和功能修辞学

在描述语言的修辞手段时，陈望道先生区分出两类不同的修辞手段：积极修辞手段和消极修辞手段。（陈望道 1979）这一区分同样适用于功能修辞学的研究。如果说在科技语体中，术语的使用必须与该语体主题相吻合，那么在其它的语体中（例如文艺语体、政论语体等等），术语则会因符号语义内外使用者因素的不吻合而获得了某种特殊的表现力。上面所引到的诗歌的音乐术语就是一例，其中的音乐术语不仅揭示了符号使用者本人的身份，并且（通过音乐术语组成的语言）表达了一个音乐家对自己同行密友所具有

的特殊的情感。

任何一个语言符号均以使用该符号的具体的人为其存在前提。离开了具体的符号使用者，符号也就丧失了其作为符号存在的价值，变成了某种有规律或无规律的涂鸦。“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人类社会有紧密的联系。所谓‘社会’，就是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中、说同一种语言、有共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人类共同体，即一般所说的部落、部族和民族。”（叶蜚声、徐通锵 1997：10）对于语言符号来说，其使用者是相应语言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符号使用者”这一术语既可表示该语言社会的全体成员，又可以表示其部分成员、乃至个别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说，符号使用者是一个一般和个别的统一。从某一符号的具体使用角度出发，符号使用者则是具体使用该符号的人。这时使用者在数量上的多寡——是仅仅一个人或是某个团队，还是社会全体成员——则成为判别符号属性的条件之一。这时的符号使用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言语符号使用者”，或“言语行为主体”。

“符号使用者”的另一个意义是语言层面上的符号使用者，即在符号本身固定下来的相应“使用者”的属性。符号及其使用者之间在语言发展过程中长期的相互作用关系，导致了使用者的某些属性最终被固定在符号上。索绪尔在谈到语言符号系统的特点时指出：“在这些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索绪尔 1985：36）。不应该因此得出结论认为符号使用者的介入使得语言符号（区别于言语符号）原本同质的属性遭到了破坏。符号语义内部的使用者因素，同样也应被视为是一种心理的东西，是符号外言语符号使用者的某些属性经过社会的挑选而折射成语言意义的结果。在论及认识的主客体关系时，俄罗斯哲学家科普宁认为，当研究的目的是要认识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时，可以看到在客体中主体的某些社会属性表现得尤为明显，从而构成了主体对客体的理论把握形式。（科普宁 1982：5-109）在符号和符号使用者的相互关系中，后者的属性之所以能在前者中固定下来，是由语言作为社会交际手段所具有的交际功能决定的。

语言层面的符号使用者是言语符号使用者属性抽象固化的结果。可以认为，前一个概念更多地属于历时性概念，而后一个概念则为共时性概念。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作为言语符号使用者因素，要想在被固化于某一词语后成为其中的语言符号使用者因素，并具有经常的、稳定的特点，就必须获得整个语言社会的承认。历时性符号使用者和共时性符号使用者的关系在于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又对后者具有某种限定作用。鲍都恩·德·库尔德奈十分精辟地指出“语言机制，它在某一时期的结构和组成是其全部前史的结果，是其整个先前发展过程的结果，并且反过来将作用影响语言后来的发展”。（В. Звегинцев 1960: 241）如果说共时性符号使用者体现的是与符号使用者相关的各种现实性关系（其中当然也不无某种程度的抽象过程），那么，历时性符号使用者则表现为这些关系在语言中的折射。两类关系最终在语言实践中得到统一。

词语的功能语体意义恰恰反映了符号使用者的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例如，在俄语研究中，许多修辞学家均指出下列词语的诗歌语体色彩：лира, муза, мурава, десница 等等。在语言的内部符号使用者和外部符号使用者结合的过程中（这一结合表现为两个符号使用者的吻合或分离），这一特定的功能语体意义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例如在下面文本中的“десница”一词：

Как ястреб, богатырь летит  
С поднятой грозной десницей  
И в щеку тяжелой рукавицей  
С размаху голову разит.

(А. Пушкин, Руслан и Людмила)

... мы поблагодарим либералов: если они своей оппозицией расшатают союз самодержавия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связями буржуазии и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Говорим “если”, ибо своим кокетничанием 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м, своим превознесением мирной культурной работы, своей войной против “тенденциозных”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и т. д. либералы расшатывают не столько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сколько борьбу с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м. Неуклонно и непримиримо разоблачая всякую половинчатость либералов, всякую попытку их заигрывать с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мы тем самым и будем обессиливать эту предательскую сторону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оспод либеральных буржуа, мы тем самым будем парализовать их *шуйцу* 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наиболь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их десницы”. (В. Ленин)

古体词 десница 所具有的崇高色彩在第一个例中被保存下来，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嘲讽意味的出现。

在功能修辞学中，一种最常见的分类法即所谓功能语体的分类。这一分类就其实质来说是对社会中的符号使用者的一种最广泛意义上的分类。在一些研究者看来，这样一种分类反映了语体的最深刻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每一个语体都有与其相适应的词汇和语法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符号—符号使用者”关系并不能说明词语的全部功能语体色彩，后者实际上是词语内部的所有意义因素与相应的词语的全部外部意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郝斌 2003：224-243）然而，对于语言单位的功能语体意义来说，“符号—符号使用者”关系却是最重要的因素。特定的符号使用者对不同语言符号在使用上的“偏爱”久而久之会使相应的语言符号染上该符号使用者的属性。另一方面，“符号—对象（概念）”的关系对于词的功能色彩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作用。“微分”、“积分”、“导数”等词语常常被用于在数学中，并不是因为数学家们对这些符号具有某种特殊的偏爱，而是因为这些符号表示着数学中的基本概念，离开了这些术语人们就无法从事数学活动。在语言中，为了表示某些词语的功能语体色彩，重要的不是这些词具有某种特殊的事理—逻辑意义（在这方面，可以说所有的词语在相互对比中都能显现出某种特殊性），而在于与这些词在语言中共存的还有一些功能上中性词语。正是后者衬托出前者的功能特点（例如俄语中的下列对应词语：лик — лицо, очи — глаза, десница — правая рука 等等）。至于谈到两类词在言语使用中的不同特点，则后者更多地由语言的约定俗成所决定，取决于众多符号使用者在长期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对词语的选择。当这一最终选择关系被固定到了某一语言符号之后，我们就称这种明显显示出的符号使用者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为词语的功能语体意义。不仅如此，考虑到词语的内容和形式的不可分割性，当我们谈到“符号”时，我们实际已经考虑到了它的内容——“符号的事理—逻辑意义”和“符号—符号使用者”的之间的各种关系。正是从这样一种观点出发，我们将词的功能意义归结为“符号—符号使用者”的关系。

另一方面，语言的交际功能决定了词语在语言社会的广泛使用。因此，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是一些在功能上中性的词语，或者是“可用于任何功能的”的词语。这也从另一方面为我们在意义结构内部区分出符号使用者提供了依据。

在功能修辞学中，研究者们所感兴趣的不仅是功能语体中语义单位语义运动的规律，还包括相应的修辞手段的特殊属性以及对它们的列举。这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任务决定的。当然，属于某一功能语体的典型代表的词语通常会包含有这些语体的基本特征。然而，我们之所以对它们进行研究，是为了弄清具有其它功能属性和功能中性的词语（后一类词语在语言中所占的绝对比重尽管不大，但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均属于常用词汇）在特定的功能语体中的基本的语义运动及语义变化趋势。犹如在经济学研究中，人们探讨上衣和麻布并不是旨在弄清这些东西的本质，而是为了弄清它们作为被用于交换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本质，借以揭示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和价值的双重性。

既然在我们的研究中基本的注意力是放在功能性词语和功能中性词语的区别上，包括关注中性词语是如何在功能意义上被“同化”这样一个语言现象上，则我们以下的研究将主要沿着这一方向进行。

#### 4 功能变体

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某一语言单位的功能意义（或色彩）的改变是否会影响到该语言单位的全部语义结构？我们还是以词汇为例来进行说明。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当某一个词语的语义结构被用于特定的功能语体时，该语言单位的语义是否会因此发生某种变化？

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建立在下列语言事实基础之上：带有鲜明功能色彩的词汇，在词汇体系中（尤其是在常用词中）只占有不大的比例。绝大多数常用词语属功能上中性词汇，即对任何语体来说均适用的多功能性词语。此外，在功能特征明显的词语和功能特征不明显的词语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俄罗斯学者们对具有功能色彩的词语的语义特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类似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在任何一部修辞学专著和教科书中看到。但是，一旦问题涉及到中性词语向功能性词语过渡（这一过渡通过中性词语在

功能语体中的使用得以实现)时其语义结构是否发生变化,则对此人们并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至少这一问题本身并没有被研究者明确地提出来)。换句话说,语言中是否存在着词汇单位的功能性的变体?毫无疑问,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词汇性功能手段开拓广阔的领域。

我们先来看一下词语的功能语体色彩及其对意义结构的影响。或者说,对于中性词语来说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意义,它们只在特定的功能场合下出现,并且具有随机临时的属性。我们首先以词语的事理—逻辑意义在口语和书面语的对比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在一部俄罗斯出版的词汇学著作中,我们通常会看到关于口语语体的下列几个方面属性:

- 1、两个或更多的人直接交际的特点,亦即口语产生的必备条件;
- 2、言语行为的无准备性,亦即无预先斟酌和推敲的语言手段;
- 3、言语交际的自由性,亦即说话人间的非正式性关系;
- 4、首先是口头语言实现的形式,其次也可能是文字的表达;
- 5、主题的非限定性,亦即可探讨各种各样的题目——从纯日常生活内容到专门职业的主题。(M. Фомина 1978: 200)

这里,第一点是口语产生的必备条件,第二点侧重的是言语形成的心理过程,第三点所谈的是说话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前三点更多地构成口语行为的情景条件,属于符号的外部因素。我们重点来看一下第四和第五点。

众所周知,人类的任何言语行为都离不开口头形式。尽管口头形式和书写形式同为语言表达的两个形式,然而在人类的言语实践中,前者的作用无疑要比后者大得多。这是因为:首先,口头形式是语言产生的本源形式,就起源来说它远远早于人类语言的书面形式。其次,人类从听到读写进而掌握语言的特点也决定了口头形式就其在交际中的作用来说要远远重于书写形式。再则,在任何的社会中,文盲只是一些不会读和写的人,而不是那些不会讲话和听不懂别人说话的人。俄语中(безграмотный)和汉语中(“文盲”)等词语的内部形式本身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口头符号和书写符号之间的关系是前者为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书面表达形式。任何书面表达都要以口头形式为前提,而任何口头形式都可以归结为一定的语言形式。因此,上述研究中所提到的五个特征中的第四点看来并没有揭示口语的本质特征。

第五点乍看上去含有一定的道理:交际的双方可以天南海北谈及任何题目,而对于写书的人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跑题。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一切并不像看上去那样一目了然。

首先产生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主题”?西方语言中的主题一词源于希腊语的 *thema*,原义是表示作为基础的东西。根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定义即“描写、描述、研究、讨论等的对象”。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主题”是“言语内容的中心”。在口语中,相互之间通过某一内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最短片断就构成了特定的主题。那么,书面语中的情况如何呢?这里是否也存在着某种主题?对于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不仅整部作品的情节是依据一定的构思围绕着一一定的主题展开,而且作品中的每一章、每一节又有其特定的主题。从宏观的角度说,书面语中的每一种功能语体都构成独立的主题,其中又可区分出种、类等主题。从这点出发,可以认为对语体的功能分类也属于一种对主题的分类,即按内容的分类或者从内容到形式的分类。例如,俄语公文语体内部通常可以进行以下的分类:1、决议;2、指令;3、命令;4、布告;5、告示;6、备忘录。(A. Кожин, O. Крылова, B. Одинцов 1982: 59)

如果再考虑到我们的出发点是口语与书面语的对立的二分法,则可以说两种语体和它们的分语体在主题上的区别同语体间的对立一样,同样表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

口语之所以给人们以“多主题”的印象,是因为这一言语行为总的来说时间短,因此导致对新旧话题之间区别和交替感觉敏感。而在各本书之间,在一部著作的章节和片断之间常常有比较长的时间间距,因此相应的言语行为更多地显现为独立的言语行为,产生被感觉为相互无甚联系的言语作品,从而更突出了有关“主题”的印象。然而,正是在那些我们感觉到不存在任何联系的地方,却可以找到这种联系。言语中主题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在于这些主题属于同一语体,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它们的内容加以比较。而在书面语中,主题之间的联系同样是因为它们是同一语体范畴的主题。至于说到对时间间隔的感觉,并由

此决定的主题之间的区别，则认为它仅仅是一种感觉，并且可能是一种错觉。

同主题不确定相关的是口语的突发性、预先无准备性特征。这里涉及到有关言语生成过程的研究。人类目前尚不清楚其言语产生的机制，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也未弄清。也就是说，人们目前并不清楚语言仅仅是表达思维的手段，还是构成思维的方式。（克雷奇等 1981：217-218）口语确实具有某种突发性。但是，在实际上交谈双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语言的形式，而是所表达的内容和某些情态，后者不仅取决于说话人的意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具体的语言环境。“语境或上下文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的作用在于决定一个词在某种情境下所要表达的意义，而且在每种的词都发生的语义变化中，它是最有力的因素之一。”（帕默尔 1983：67）因此，相对确定的情景看来可以作为言语行为的某种准备阶段。如果是这样，是否还应该认为口语具有突发无准备的特点吗？

至于上述特征中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则我们看到，它们仅仅涉及某一言语中的具体使用者，即仅仅构成语言单位意义运动的外部条件。这里重要的是在这些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词语本身的意义结构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我们通过我们的语义结构的三棱镜去观察口语，则我们会发现这里忽视了其中的事理—逻辑意义因素。

口语的一个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情景性，这一点决定了口语中所使用的词语在语义结构的对象意义和概念意义上的相对确定性。“确信谈话对方能够看到所谈论的事物，从而理解说话人这一情况造成了口语的直接情景性。认为交谈对方预先就了解某一情景，使得说话人免去了许多解释。因此，也可以说口语具有间接的情景性。情景性的程度可以各不相同。”（O. Сиротинина 1974: 158）

在口语研究中，一个较公认的观点是：口语只限于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言语行为。（科仁娜 M. H.: 259）这样，我们就将我们的研究限定在了纯口语的范围内，而不去考虑书面语的影响。当然，要想完全排除书面语的影响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从未有过文字存在的社会，那里人们的语言从未受到过书面语的影响。然而，这仅仅是纯研究的理想，这一理想对我们的研究来说并非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之所以研究口语的特点是要将它和书面语相比较，而如果没有了书面语，研究口语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例如，研究者们通常不会将讲演作为一种口语的形式。

如果对应于我们所提出的词汇语义结构（郝斌 1987）将词汇根据它们在事理—逻辑意义上的区别区分为单一—事物词汇（体现 F—D 关系）、表类事物词汇（体现 F—DG 关系）、表属性词汇（体现 F—GD 关系）和表抽象概念词汇（体现 F—G 关系）四类，那么，在将口语和书面语进行比较时，我们将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全部包括功能语体词语和中性词语在内的语言单位的语义结构在口语中都呈现出一个由概念向对象运动的倾向，或者说其语义存在着一个从抽象内涵向具体运动的转化过程，即：G→GD→DG→D的过程。

口语的这一特点早已为研究者们所指出。例如，西罗季尼娜在将口语与书面语的后缀进行比较后写到：“一个典型的情况是书面语后缀-ение(-ание)在口语中位于通用后缀之后处于第二位。与此同时，带有后缀-ение(-ание)的名词常常被具体化了”。（O. Сиротинина 1974）科仁娜也指出在口语中广泛使用日常词汇和具体性词汇，而抽象的书面语词汇和术语则不常使用。

反之，书面语词汇则具有相反的运动趋势，即：D→DG→GD→G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谈到词义在某一语体中运动的趋势时，我们所考虑的这一运动总是在对立的语体背景下才能衬托出来。如果我们将口语语体和书面语语体都综合作为人类言语行为来考虑，那么总的来说，词语是呈现出从具体向抽象的运动属性。这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过程和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深化的过程。因此，词义结构的运动这里只能作为某种相对的概念来理解，作为在另一种语体背景下的语义运动来被认识。

## 参考文献

- [1]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1963 Стилистика Теория поэт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Поэтика[M]. М.
- [2]Звегинцев В. А. 1960 История языкознания 19 и 20 веков в очерках и извлечениях(ч.1)[M]. М.
- [3]Кожин А. Н., Крылова О. А., Одинцов В. В. 1982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е типы русской речи[M]. М.



- [4]Сиротинина О. Б. 1974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ь[M]. М.  
[5]Фомина М. И. 1978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русский язык[M]. М.  
[6]陈望道 1979 修辞学发凡[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7]郝斌 1987 词义结构与词的翻译特点[J], 中国俄语教学, 第3期。  
[8]郝斌 2003 词汇语义学—兼论翻译的词汇语义基础[M],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9]科普宁 1982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导论[M], 求实出版社。  
[10]克雷奇等 1981 心理学纲要(上)[M], 文教出版社。  
[11]索绪尔 1985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2]帕默尔 L. R. 1983 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3]徐师曾 1962 文体明辨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4]叶蜚声、徐通锵 1997 语言学纲要[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On the Function Meanings of Language Signs

Hao Bin YU Y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I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not only acts as a passive tool, but actively affects the communicative process. After being used in certain context for some time, some language means and language unit may acquire a certain functional meaning in use.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semantic structures of the language signs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functional rhetoric meanings are actually a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facto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gns and sign users plays the leading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Key words:** language sign semantics; sign user; functional color

**收稿日期:** 2007-09-09

**基金项目:** 本文为黑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6D09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郝斌(1955-), 山东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语义学, 巴赫金理论研究, 俄汉语对比研究。于洋(1969-), 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 词汇语义学, 语篇语言学。

**[责任编辑: 薛恩奎]**